

东村往事

1930~1970

郑卫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村往事

1930~197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村往事: 1930~1970 / 郑卫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7457-9

I. ①东… II. ①郑… III. ①乡村—地方史—日照市—1930~1970

IV. ①K29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57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铁楠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编号
13YZA840037〕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资助。

前 言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状况对于 70 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更遑论“80 后”“90 后”，乃至“00 后”的青少年。其实，比较而言，这段时间距离我们并不久远，产生如此隔膜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中国来说，20 世纪是满盛动荡、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入到个体的思维模式，国家的治理结构，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实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加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追崇改革创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人们在热情追逐新事物的同时，“旧”事物乃至“旧”的生活方式或被抛弃，或被遗失，或被灭失。其二，中国现当代史的书写模式缺乏底层的叙事视角，历史教科书呈现的主要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显赫的政治、历史人物，广大的底层民众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宏大叙事式的史学缺少对底层民众丰富多彩生活的关注，以至于接受如此史学教育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现、当代史的了解缺乏全面性和丰满度。因此，当我们回望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时候发现，本应熟悉的生活场景生疏了，本应连续的文化传统出现了裂痕。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有其来路。不了解过去，就难以知晓现在，更无法预测未来。近在咫尺的历史不应被过早地遗忘，我们需要重识已经生疏的生活场景，弥补文化传统中的裂痕。这既是做好当下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等实务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代社会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帮助我们了解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最直接的途径是采集经历了那些年代的人们历史记忆。这些生活记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具有无可估量、不可替代的价值。正是出于上述认识，近些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

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①,人们“自觉走向田野,铢积寸累个人化的口述题材”^②,“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本书的分析资料主要是对东村^③年长者的访谈记录,对他们生活记忆追问的时间跨度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东村是一个普通的鲁东南村庄,历史上没有出过显赫的科举人士,也没有真正的地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富裕的家庭不过是拥有三十多市亩良田的富农。抗战时期,这里是根据地前沿游击区。在记录20世纪大事记的地方县志或市志中,除了全县土改复查大会于1947年在东村召开并被记入《日照市志》之外,东村发生的故事没有在当地史志上留下任何痕迹。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不妨碍它成为我们的调研对象,因为我们就是要看普通村庄的普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什么?在他们的人生中发生了哪些事件或故事?这些事件或故事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等等。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更能反映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能够从细节上还原历史的原貌。本书中的口述资料尽量保持访谈原话,包括语序、情绪与口吻,因为笔者体会到,最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可能恰恰隐藏在受访者无意流出的只言片语中,乡土语言的用词及词汇顺序中都蕴藏着信息,句末的一个语调变化可能使整句话变为反意。作为研究者对此不能不察,读者阅读时也需要把受访者的话语放入整个对话语境中去理解和体会。在书中,对于容易产生歧义的方言表达,会通过页下注释的形式予以说明。

笔者在2004—2009年间多次前往故乡山东东村开展田野调查(部分调查工作由南京大学博士学位候选人钟霞同学协助),前后总计整理出逾50万字的口述史资料。根据这些田野调查数据,已经出版《村落社会变迁与生育文化:山东东村调查》^④《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⑤两本专著。但是笔者认为,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蕴藏在资料中间尚未得

①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105页。

② 杨念群等:《新史学(上卷)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③ 遵循学术惯例,书中东村及周边村庄的村名、东村所属镇名、被访者姓名,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调研对象隐私的人名、地名等均已做处理。

④ 郑卫东:《村落社会变迁与生育文化:山东东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钟霞:《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到有效挖掘，特别是研究中自己的一些困惑及学术问题，有待继续深入思考，如：（1）为什么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东村村民放着“安生日子”不过，加入中国共产党？（2）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山东县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状态？（3）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如何在乡村组织动员村民参加革命活动？（4）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村落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如何？（5）日寇铁蹄下的村落生活是何种样态？村民持有哪些“抗战”记忆？（6）作为一个“穷汉村”，东村的土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7）土改复查时扫地出门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其间发生了哪些冲突？（8）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乡村社会生活状况如何？（9）合作化运动如何在村级层面展开？（10）“大跃进”运动如何在村级层面展开？（11）“大跃进”时期村民的具体生产、生活如何？（12）集体化对中国村落社会变迁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本书所呈现的内容会帮助我们思考上述问题的答案。

关于口述史资料的特点，有必要做些交代。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个学术词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在 1938 年创意发明的。不过，内文斯的贡献仅在于发明了这个词汇，现代口述史则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美国发端。到 80 年代，口述史学在美国已经受到空前的重视。^①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口述史学已经成为“人皆用之法，因为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口述史学因其在认识上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在叙事上的生动性和感人性及在表现形式的灵活性等特点，使读者可以更直接和深切地体会、感悟和理解历史，从而使其产生吸引读者的独特魅力。”^③“读者所以喜欢口述历史，除了独特的学术取向和历史眼光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读者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发现了被以往那些历史记载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的史实……口述者的个人身份使得他们可以不必根据既定的结论剪裁史实，从而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历史的视角，有助于人们刷新历史的成见，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和

① 傅光明：《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② 杨祥银：《当代美国的口述史学》，载王俊义、丁冬主编《口述历史》（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6 页。

③ 徐国利：《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3 期。

盲点。”^① 社会学研究口述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学的研究,社会学的路径试图将个人的口述史与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结合起来,‘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② 而且,郭于华认为,“口述史研究的要务并非‘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治疗充满病患的历史’。底层生活的口述史不是为正统的文字史、精英史拾遗补缺。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③ 口述史资料的这些优点无疑是我们对其青睐有加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对社会史的关注归根结底源自现实的需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曾经说过,“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④ 对当下新农村建设方向的思考以及乡村治理的诸多现实问题,均需要我们回望传统,把中国乡村的过去、当下与未来这条线连接起来,如此才能做到知所来、晓所往,使中国乡村建设少走弯路、歧路。本书关注20世纪早、中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状况,目的是了解现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们的处世规则、意义归属系统等,总结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路径,为有效治理当下的中国乡村获取思想、理论、方法及经验的资源。

保尔·汤普逊曾经热情地指出,“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⑤ 在充分肯定口述史的工具价值之外,我们亦需直面学界对口述史的批评。“回忆无论多么明确、生动,都受了事后经历的影响,可能由于受其他方面(特别是宣传媒介)的影响而使回忆变得不纯;可能因人们的怀旧情绪使回忆带有感情色彩或因童年不幸的遭遇一直深藏心底而使回忆变形”“即使认为口述证据是真实而未受影响的,仅用它来整理过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历

① 解玺璋:《势头强劲受青睐 忽然火了“口述史”》,《北京青年报》2003年10月9日。

② 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⑤ [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转引自徐雁斌《浅论口述史的发展与特色》,《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史事实并不是个人经历的总和”。^①“对口述者而言，的确存在一个记忆如何运作以及是否可靠的问题。他们在回忆的过程中，无论主观上是多么趋向于再现历史真实，但在客观上，受记忆规律的制约、受个人情绪、情感以及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残缺、变形的可能性。此外，我们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即口述者根本就无意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忆。”^②

如何面对口述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学界提出了两种思路：其一，“除了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口述史料而不是依据一个传闻、一次个人谈话，还应该同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能较有效地克服口述史料本身的局限性。”^③其二，陈春声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④“口述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真实，还在于重构历史意识。不仅在于描述历史，还在于解释历史。不仅在于佐证与补充旧有的书面文献资料，还在于发掘新史料。基于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寻找处理记忆偏差的有效方法，分析产生记忆偏差的原因，解释此记忆偏差背后所揭示的历史意识，使主观非真实转化为客观真实。”^⑤我们的田野调查既注重多元资料的收集与相互佐证，也注意对同一事件的多主体回忆的比对，方便读者从中寻觅记忆偏差产生原因的踪迹。

以重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状况为目的的口述史工作具有紧迫性、抢救性的特点。^⑥随着当事人因年事已高而自然逝去，他们的生活记忆亦

① [英] 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 年第 4 期。

② 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史林》2004 年增刊。

③ 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特点及对我们的启发》，《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④ 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1—32 页。

⑤ 王艳勤：《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史林》2004 年增刊。

⑥ 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特点及对我们的启发》，《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

随之消失，使得弥补“生疏”与“断裂”的努力越发困难。在笔者结束东村调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年7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有7位已经离开人世，在当年60多岁的受访者中也有6位已去世。这更让笔者认识到当年田野调查资料的弥足珍贵，坚定了把这批资料整理分析出版的决心。衷心感谢东村父老乡亲给予我们调查的支持，感谢日照市档案馆的热情接待，感谢日照史志办王宜峰同志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丁权军、丁权布、丁权后、丁佩银、丁佩源等的突出贡献，感谢钟霞同学的一起调查及专业帮助。本书出版受惠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编号13YZA84003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2014BSH003）、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编号14ZS144），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资助，一并致谢。

目 录

一 村落概况	(1)
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土地占有与农作物种植情况	(7)
三 旧时农民“打工”	(12)
四 曙光小学与日照暴动	(19)
五 对农民参加暴动的思考	(31)
六 祠堂、族谱与村政	(36)
七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生百态	(43)
八 抗战时期村党组织的活动	(52)
九 抗战记忆	(57)
十 抗战时期的杂牌子队伍与村庄社会组织	(64)
十一 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乡村教育	(70)
十二 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	(73)
十三 日照县土改复查运动的发起	(79)
十四 东村土改复查批斗会	(87)
十五 分配翻身果实与划分阶级成分	(93)
十六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乡村生活	(97)
十七 挤售余粮与斗私商粮贩	(105)
十八 合作化运动	(113)
十九 人民公社物资筹集	(127)
二十 “刮五风”	(132)
二十一 大炼钢铁	(137)
二十二 公共食堂	(142)
二十三 东村困难时期的生活记忆	(152)
二十四 “农业六十条”之后	(157)

2 东村往事:1930~1970

二十五	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劳动	(162)
二十六	“闹造反”	(167)
二十七	集体化时期的分配与生活评价	(169)
二十八	集体化时期的村干部	(174)
附录一	20 世纪村落家庭结构、家长权威与家庭生育的变动	(182)
附录二	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	(192)
附录三	抗战初期日照的武装斗争:郑子久回忆	(209)
附录四	访谈名录	(215)
附录五	东村历年户数与人口	(219)
附录六	集体化时期东村大队部分统计资料汇总表	(221)
参考文献		(227)

一 村落概况

(一) 东村地理、人文状况

东村现行政隶属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H 镇^①。

日照市地处东经 118°35′—119°39′，北纬 35°04′—36°02′，在山东半岛南翼，东临黄海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西接沂蒙老区临沂，南与江苏省赣榆县接壤，北与青岛市、潍坊市毗邻。至 2013 年底，日照市辖东港区、岚山区、莒县、五莲县、日照经济开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共 11 个街道、4 个乡、40 个镇、1782 个村，总面积 5359 平方千米，人口 290.13 万人。在 1985 年之前，日照县隶属于临沂地区。1985 年国务院批准日照县升级为县级市，1989 年正式成为地级市。^②

日照市属暖温带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受海洋的调节，与同纬度内陆相比，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春季干旱少雨，风多回暖迟；夏季湿热，降水集中，易成涝；秋季凉爽温差大，晚秋旱；冬季干燥无严寒，雨雪稀少；构成了春旱、夏涝、晚秋又旱，旱涝不均的气候特点。日照市年平均气温为 12.6℃，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868.5 毫米。年平均无霜期为 213 天，市内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量年际和季节变化大。早年出现概率为 29.6%，成为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旱灾特点是发生频繁，持续时间长、范围大、危害重。

在历史上，日照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古有姜尚〔子牙〕、吕母、刘颡、焦贛等；近有 1905 年加入同盟会的山东分会主盟人丁惟汾，山东倒

^① H 镇地处日照市东港区西南部，陆域总面积 125 平方千米，辖 61 个村，总人口 5.9 万，是山东省政府确定的“小城镇建设中心镇”。

^② 1985 年 3 月 22 日，国务院批复日照县与临沂行署石臼港办事处合并成立日照市（县级市），5 月 1 日正式对外办公。1989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日照市升为地级市。

袁护国军司令薄子明，五三惨案烈士尹景伊，同李大钊一起被军阀绞死的革命党人郑培明，还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等。

东村位于日照市区西 15 千米处，交通方便，村前有日十公路与市区相接，坐汽车到城区单程约需半个小时，沿日十公路西行 2.5 千米即是镇政府驻地。该村东西长 1.5 千米，南北长 8 千米，村境面积 12 平方千米，呈长方形。村庄北依丘陵，南临河溪，面南背北，规划齐整。村前的曲河，平时潺潺，雨季大量洪水从西部山区奔涌而下，是原日照县境内最大河流傅疃河的支流。1975 年日照发生特大洪灾，倒塌房屋若干，村庄被迫从原来日十公路南面整体搬迁到现在的日十公路北 200 米地势较高处，并做村庄的整体规划。原居北岭的自然聚落也迁至新村居住。庄前至曲河间约有旱涝保收田 500 亩，主要用于菜园、种桑和蔬菜大棚。曲河南岸是地势陡高的丘陵山地，称作南岭，再往南就是横亘东西、海拔 220 米的南山。东村村后有两条道路通向北方，一条是通向村后丘陵农田的生产通道，一条是与北岭后皋陆村相连的村间马路。村后丘陵地主要是黄壤土，土质较差，易旱涝。为了浇水抗旱，集体化以来先后在村北两条沟壑上修建了 6 座小型水库（按一般标准只能算作塘坝），现在基本能解决一般旱情时农田之需。

2004 年东村有 251 户，730 口人，以丁姓居民为主，约占总户数与总人口的 70%，第二大姓为赵姓，是集体化时期从皋陆三村搬来，约占总户数的 15%；其他还有张、李、毛、刘等姓，户数很少。在集体化以前，丁姓家族按祖先埋葬的地点，分为李家林、狄子林、东北洼、东北大场子、东老林 5 个支股。现在村民相处融洽，家族观念较强。

在 1980 年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土公路，每天有一班途径该村从南麻去日照的客车，村民往返村与县城，主要靠步行，约需 1.5 个小时。当时村边的集市不多，最近的是村北 2 千米外的皋陆村集，往东距离将帅沟集 8 千米，往西距离马庄集 6 千米，往南距离范家村集 9 千米。现在随着新集市的兴起，这里形成村周围约 2 千米半径内的 5 天轮回制的集市群，其中有往东距离 1.5 千米的山字河集，往西距离 2.5 千米的 H 镇集〔镇政府驻地〕，往北距离 2 千米的皋陆村集，往西北距离 2.5 千米的陈家沟集，马庄集算是远的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村组织开始在日十公路北边批建居民楼盘，现已建成并入住的有 11 栋沿路边一字排开的二层居民楼。

(二) 行政沿革

东村的前身叫作丁家疃。1950 年根据原来村中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把丁家疃划分为东、西两个行政村。主干道以西部分和南岭自然村组成西村;以东部分与西北岭、北岭、东岭三个自然村组成东村,各自然村的位置没有变化,各户土地随各户走。至此,东村正式成为一个行政村。

丁家疃的前身叫作邵村。邵村的由来,据村碑记载,此处先有邵姓居住,人称邵家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 年),邵姓他迁,丁姓徙此居住建村,改名为丁家疃。东村的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日照县以下实行乡、隅、里、甲制,乡设乡约,隅设隅头,里设里正[也称里长],甲设甲首。据 1590 年(明万历十八年)《日照县志》记载,全县分 4 个乡、8 个隅、92 个里。丁家疃属于观兰乡尚义一隅丁家疃里。清乾隆年间,改为乡、社制,据 1758 年(乾隆二十三年)《青州府志》载,全县分 1 个镇、5 个店、4 个乡、84 个社。清朝末年,实行乡、社、村制。据 1885 年(光绪十一年)《日照县志》载,全县分关厢[城关]、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共辖 81 个社。丁家疃属于西乡[旧名观兰乡]丁家疃社,“丁家疃社领 15 个村”^①。为便于钱粮征收,乡下设牌,每乡分 4 个牌,牌设牌头,每牌辖 4 至 6 个社不等,全县共分 16 个牌。丁家疃属于西乡西上一牌。1912 年(民国元年)县地方自治筹办处将全县划为 15 个区,每区设议事会,丁家疃属于皋陆区。这时,原有乡、社仍旧保存。1931 年(民国二十年),将 15 个区并为 7 个区,共辖 162 个乡、19 个镇、1083 个村。丁家疃属于第 7 区。区被正式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设立区公所,置区长 1 人,下设财粮助理员、文教助理员等各 1 人,区丁数人。乡、镇建立乡、镇公所,设乡、镇长各 1 人,乡丁数人。村实行邻、间制,5 家为邻,5 邻为间。村设村[庄]长 1 人。1935 年,将 192 个乡、19 个镇划为 23 个乡镇,撤销区长,保留区制。^②

1939 年 6 月,日军侵占日照县城。不久,即组织傀儡机构—日照县治安维持会。丁家疃没有被日伪控制,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前沿地带,是日

① 日照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日照市志》,齐鲁书社 1994 年版,第 46—47 页。

② 同上书,第 47—49 页。

伪军队、国民党武装[包括正规军与游击队伍]、共产党武装,以及杂牌军的游击区。1940年3月16日,日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在根据地各村庄陆续建立了村政权,实行闾邻制,设村长[亦称庄长]、账先生等。办公场所为村公所,一直沿用至1954年。^①

1947年丁家疃包括1个大自然村和4个小自然村,其中小自然村分别是南岭、西北岭、北岭和东岭,全村总人口1322人,当时丁家疃隶属望海区丁家疃乡。^②1949年2月17日,日照县委拟定各区划乡草案,丁家疃隶属太平区丁家疃乡,全村250户,总人口1326人。^③1950年“分村后东村有140多户,450多口人;西村600多口人。”[丁权军,050319]^④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东村行政沿革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1950年5月,全县划为16个区,1个镇,229个乡。区按序数排列,东村隶属第12区东村乡。1956年1月,全县个别区镇进行合并,调整为14个区、2个镇、202个乡。东村隶属望海区东村乡。1958年1月,撤区建乡,改为26个乡、3个镇。东村隶属的东村乡与古城、十里、代疃、皋陆、山字河、曲河等7个乡并入将帅乡。^⑤

1958年8月,29个乡镇被改划为25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东村隶属将帅乡幸福公社。出于“大跃进”发展的需要,1958年9月,29个乡镇被合并为25个乡镇,东村仍隶属将帅乡。11月,为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山林、水利、农业经济作物区域等协作的问题,又将原有的25个乡镇合并为21个乡镇。将帅乡所辖的48个村按地理方位拆散分别并入城关、马庄、高兴、南湖等乡,其中东村在内的23个村[都在傅疃河以西]并入了马庄乡人民公社。马庄乡人民公社辖51个村,8814户,41535人。^⑥

① 日照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日照市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507页。

② 新中国成立前日照县委档案1947年永久卷59,《1947年县委组织部关于各区划、干部配备工作的材料计划》。

③ 新中国成立前日照县委档案1949年永久卷103,《1949年关于区划、干部配备等方面的登记、统计表》。

④ 访谈记录后面的“[丁权军,050319]”系指访谈对象是丁权军,访谈日期为2005年3月19日,下同。

⑤ 日照县委档案1958年永久卷295,《县委组织部1958年关于整编区划干部任免工作的讲话通知意见》。

⑥ 同上。



图1 东村区位图

注：地图中的☆为东村所在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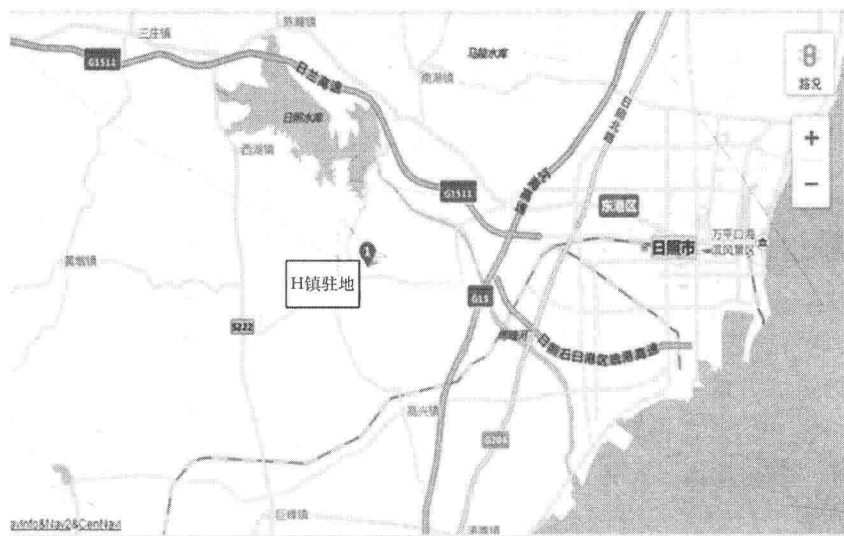


图2 东村附近交通图

注：地图中1为东村位置。